

“体用”范畴下学科年鉴的知识体系与知识服务

——以《中国考古学年鉴》为例

刘迪 周澄*

摘要 学科年鉴是记录与反映特定学科或学科分支的资料性工具书,近年来获得长足发展,但与之相关的理论探讨仍未能跟进。笔者以《中国考古学年鉴》为例,借助“体用”范畴框架分析知识体系与知识服务在学科年鉴中的表达形式,发现学科知识体系对学科年鉴框架具有构建作用的同时,年鉴也以专门部类对学科核心知识体系进行集中表达,同时也尝试外延性部类对知识体系有所表达。知识服务在年鉴中体现为建构便于定位知识点的框架结构,并完成知识点的聚合以及研究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全面系统整理。“体用”范畴所延伸出的认识和处理本体与功能的关系逻辑与思维范式,对学科年鉴编纂中知识体系与知识服务的处理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学科年鉴编纂应因循三项原则:因体起用、强体广用、以用强体。

关键词 学科年鉴 知识体系 知识服务 体用范畴

1980年《中国历史学年鉴》问世时,“编辑这种类型的年鉴没有先例可资借鉴”^①。四十年后的今天,哲学、美学、宗教、史学、考古、文学、语言、经济、法学、马哲、民族、新闻、政治、人口、管理、社会、教育、艺术、心理、生物、医药等诸多领域的学科年鉴纷纷出版。^②四十年间随着各学科自身的发展及对发展历程记录意识的增强,学科年鉴渐成规模,从发展趋势来看,或成为年鉴领域的新热点。

* 刘迪,男,辽宁省沈阳市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周澄,男,福建省南平市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① 《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组:《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543页。

② 张昊鹏:《中国学术年鉴发展报告》,冀祥德主编:《中国年鉴发展报告(2017)》,方志出版社,2017年,第191~194页。

学科年鉴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年鉴类型,所受理论关注十分有限,仅有《论专业学科年鉴的质量与编辑素质》^①《试论学科年鉴的创新》^②两篇论文对其进行专门论述,或是在讨论“学术年鉴”时偶有涉及^③。这与学科年鉴的实践发展并不相称,理论的缺失已潜在制约其进一步的发展。笔者拟以“体用”范畴为分析框架来观照学科年鉴中知识体系与知识服务这一对最为核心的矛盾,探讨它们如何各自表达并最终塑造出学科年鉴的特有面貌,进而提炼学科年鉴编纂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学科年鉴编纂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一、学科年鉴的核心问题与“体用”分析框架

目前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在其“年鉴级别导航”中将“学科年鉴”作为一种类型,与中央综合年鉴、地方综合年鉴、中央行业年鉴、地方行业年鉴、统计年鉴、企业年鉴、地方年鉴、其他年鉴并列。^④这种年鉴分类方式说明学科年鉴已获得认可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在理论上对其进行科学定位与内涵界定仍是展开深度讨论的基础。

(一) 学科年鉴的定位与界定

关于学科年鉴在年鉴体系中的位置,肖东发认为其隶属于第一层级“专科性年鉴”,与部门性年鉴、产业性年鉴、专门性年鉴、单位性年鉴并列为第二层级;^⑤许家康认为其隶属于第一层级“专业性年鉴”,与界别年鉴、行业年鉴、企事业单位年鉴等并列为第二层级。^⑥这两种代表性年鉴分类体系,具有共性的是学科年鉴均属于体系的第二层级,一方面说明此类年鉴体量上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其较强的专门性;细微的差异体现在上一层级类名的文字表述,但无论是“专科性”还是“专业性”,均表明了此类年鉴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关于学科年鉴内涵的界定,有学者认为,“学术年鉴也称学科年鉴”^⑦。将学科年鉴与学术年鉴等同的观点颇具普遍性。“学术”侧重表明学科问题的科学研究,而“学科”更侧重表达某一独立研究领域的知识体系,前者所指更为抽象,而后者则相对具体。因而,在指称某一具体研究领域的年鉴时,学科年鉴比学术年鉴更为准确。此外,学术年鉴涉及的范围比学科年鉴更为广泛,如《北京社会科学年鉴》中涉及北京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情况,

① 周骊:《论专业学科年鉴的质量与编辑素质》,《年鉴信息与研究》1998年第4期。

② 周骊:《试论学科年鉴的创新》,《年鉴信息与研究》2002年第4期。

③ 张靖晗:《改革开放初期创办学术年鉴之“初心”考——以10部学术年鉴创刊号为例》,《史志学刊》2018年第6期;张勇:《学术年鉴的存史与鉴今——〈郭沫若研究年鉴〉学术价值刍议》,《中国年鉴研究》2019年第1期;姜阿平:《论学术共同体视角下的学术年鉴功能演化》,《中国年鉴研究》2019年第4期。

④ 中国知网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https://navi.cnki.net/KNavi/Yearbook.html#>。

⑤ 肖东发等:《年鉴学》,方志出版社,2014年,第126~130页。

⑥ 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线装书局,2006年,第11页。

⑦ 余日蓉等:《论文史鉴传记实用文写作》,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已超出具体的学科的范围,应属综合性的学术年鉴,而非学科年鉴。也有学者认为,学科年鉴,即反映某一学科年度进展的、学术性较强的年鉴,多由学术机构或专家组成的编辑部编纂。^①而对于该定义中“某一学科”的理解在现实中需作适度拓展,“学科”可能包含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甚至更小的分支学科,如《中国辽夏金研究年鉴》便是历史学特定分支的学科年鉴。

(二) 学科年鉴的基本面貌及核心问题

不同类型的年鉴具有不同的面貌,即形态上呈现出自身类型所独有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由不同逻辑构建成的宏观框架。学科年鉴也具有自身较为独特的面貌,本文仅以《中国考古学年鉴》为例管窥。

该年鉴1984年以来每年编辑出版1部,至今已编辑出版35部。其框架结构历年均有不同程度调整,基本控制在六至十个部类不等。当前年鉴的基本框架定型于2014年。对比2018年卷与1984年卷《中国考古学年鉴》框架(见表1),可见在部类设置上保持着较强的连续性,考古学研究、考古文物新发现、考古教学、对外学术交流、逝世考古学家、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等六个部类为两者共有,其中2018年卷“考古教学”演化自1984年卷“高等院校考古、文博专业简介”,这六个部类构成该年鉴最为稳定的核心内容,涉及学术、考古动态、教学、交流、人物、资料等不同方面。

1984年卷与2018年卷《中国考古学年鉴》框架对比

1984年卷	2018年卷
考古学研究	考古学研究
考古文物新发现	考古文物新发现
考古研究、文博机构简介	赴外考古
高等院校考古、文博专业简介	学术会议
考古学会简介	对外学术交流
文物保护工作	考古教学
对外学术交流	逝世考古学家
本年逝世考古学家	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
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	大事记

对比机构年鉴,如果说机构年鉴从机构的各项主要功能出发构建其框架的话,^②那么学科年鉴之中有着怎样的因素和怎样的逻辑在塑造其当下的面貌?这一问题指向学科年鉴的实质,亟待解答。

(三) 作为分析框架的“体用”范畴

学科年鉴作为一种记录与反映特定学科或学科分支的资料性工具书,学科性和工

^① 高俊宽:《信息检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第322页。

^② 刘迪:《中国博物馆机构年鉴刍议》,《中国年鉴研究》2017年第1期。

具性构成了其底层逻辑,而两者的并置恰好映射出一种极具哲学意味的“体用关系”。由此,在学科年鉴的分析中,“体”与“用”这对范畴便具有了作为分析框架的现实观照意义。

“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最能体现国人运思理路的一对范畴。其历史久远,萌芽于先秦,成熟于六朝。“体”指本体、本质,有时与“道”同义;“用”指应用、功用。二者有统一的一面:“体用同源”“体用不二”;也有对立的一面:“体”是根本性的,具有决定意义,而“用”则是“体”的外化,由“体”衍生而成。近代以来,“体用”开始突破在某一事物内部的言说范围,转而拓展至不同事物之间。简言之,“体用”是指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从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乃至近代以来‘保种保教’,国人均裁之以体用”^①,可见“体用”范畴作为问题分析框架的实际应用由来已久,介入到学科年鉴的讨论中仅是一种古典研究传统在当下具体研究领域的延续。

二、知识体系与知识服务:学科年鉴中的“体”与“用”

“学科”包含着双重涵义:一是作为知识的学科,二是围绕具体学科建立起来的组织及其活动。^②前者总是以特有的知识内容与形式结构为一定的有机体,即知识体系,它是学科的独特逻辑结构、内在价值与本质属性三者的统一。而后者与知识的生产、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变迁有着密切的关联,是知识体系的外延与拓展。

(一) 知识体系在学科年鉴中的表达

知识体系的内核与外延无疑构成了学科年鉴的本体。缺少知识体系支撑的学科年鉴必然是一堆零碎的、片段化的信息。学科年鉴编纂者智慧的体现正是将学科内碎片化的信息整理并纳入一定的知识体系。而这一过程可视之为对学科年鉴面貌的塑造。知识体系在《中国考古学年鉴》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考古学知识体系内核与外延构建起《中国考古学年鉴》的框架结构。学科年鉴倾向于体现“学科”的双重性,年鉴信息覆盖的全面性要求学科年鉴的内容往往并不囿于知识体系的内核,还要观照到学科知识体系的外延,即与学科相关的人物、组织与活动,由此也形成了年鉴面貌的“杂糅”,并非像一部专著或教材一样单纯表述其知识体系的核心。具体而言,“考古学研究”部类最能体现考古学知识体系;而其他部类则属于知识体系的外延,“逝世考古学家”是与学科相关的重要人物,“考古研究、文博机构简介”“高等院校考古、文博专业简介”“考古学会简介”是与学科相关的组织,“考古文物新发现”“赴外考古”“学术会议”“对外学术交流”“考古教学”是与学科相关的活动。年鉴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征着知识体系的不同面向与圈层。

^① 夏静:《体用的思想谱系与方法意义》,《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② [美]伯顿·克拉克主编,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第二,以专门部类对考古学核心知识体系进行集中表达。“考古学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年鉴》从创始一直延续至今的部类,且一直居于卷首的显著位置,其在《中国考古学年鉴》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它对前一年度考古新资料以及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 with 概括,体现了考古学核心知识体系的演进及学科发展动向,且具体条目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相关专家撰稿,保证了知识的权威性。^① 在其二级类目上,《中国考古学年鉴》采用历史阶段为主、专题为辅的思路布局,如1984年卷《中国考古学年鉴》“考古学研究”的二级类目有“古人类学”“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至明清考古”“科技考古”“夏文化探索和早商文化研究”,其中涵盖了考古学重要的分支领域,又兼顾到上一年度考古学领域研究的新兴热点与重点,由此形成兼顾学科知识体系稳定性与年度学科特色的灵活架构。

第三,外延性部类对知识体系构建的尝试。除在专门部类中进行核心知识体系的集中表达外,《中国考古学年鉴》也注重外延性部类在广义“学科”的某一侧面使信息重新结构化,形成专属于某一部类主题的知识系统。如在“学术会议”部类中以“学术研讨会”这一活动形态有效整合了年度内不同主题会议中领域内专家、学者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发表的最新观点,这本身也构成了一种知识体系的表达。再如,“逝世的考古学家”部类记录了上一年度逝世的考古学家的生平、观点、著作与成就,其中学术成就的系统梳理也可视为以人物为中心的微观知识系统的构建。

(二) 知识服务在学科年鉴中的表达

年鉴被定义为“系统辑辑上一年度重要的文献信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②。工具书,其作用通常包括指点读书门径、提供专业线索及最新研究成果、汇集专业资料等,其编纂的根本目标指向读者利用其来解决自身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用”是对其属性和存在价值最为妥帖的概括。如《中国考古学年鉴》创始时便树立这样一个目标:“给全国广大考古文物工作者及从事其他有关学科研究的同志提供方便”^③。“提供方便”的表述虽语义较为模糊,但仍传达出一种实用的取向。

学科年鉴的“用”具体为向相关读者提供知识服务,即通过年鉴的编纂提供满足服务对象所需的与具体学科相关的知识内容与获取路径,使之迅速高效获取有效知识以解决或解答相关问题。由此,学科年鉴也便具有了联系读者与学科的中介意义。知识服务在《中国考古学年鉴》中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建构便于定位知识点的框架结构,并完成知识点的聚合。“用”作为一种编纂目的,不仅要求编纂者做到对相关信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地甄别以形成科学、客观的知识,还要考虑读者的背景及其已有的学科知识体系,以形成与之匹配的年鉴结构框架,以建立高效的知识获取路径。如读者想了解2017年隋唐长安城遗址的调查与研究状况,无法从

① 李健民:《对〈中国考古学年鉴〉特色的几点认识》,《年鉴信息与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肖东发等:《年鉴学》,方志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③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72页。

年鉴目录中进行定位,便需依靠其原有知识体系,在书中先定位到“考古学研究”部类,再定位其中“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考古”类目,进而定位“城址发现与研究”分目,最终找到“隋唐长安城遗址”条目。具体的问题往往并不直接体现在年鉴的目录中,因而只有遵循学科内作为共识的知识体系所建构起的年鉴框架,符合领域内专业人士既有知识结构,才便于利用。同时,知识服务还体现在知识内容的聚合性加工上,如2017年卷“隋唐长安城遗址”这一条目,《中国考古学年鉴》整合了2017年度包括《考古》《文博》《中国文物报》等专业期刊与报纸的相关文章信息,^①形成新的具有独特价值的知识产品,便于读者快速对相关问题进行综合而全面地把握,进而提高其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的效率。

第二,研究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全面系统整理。考古文物新发现和相关文献资料是考古学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材料,因此,《中国考古学年鉴》形成了两个专题部类“考古文物新发现”和“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这两个部类可视为面向特定研究诉求的知识仓库,而对知识仓库的建构和组织是学科年鉴实现知识服务的必由之路。“考古文物新发现”部类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逐一介绍上一年度该区域内的重要考古发现,内容全面而简明,使读者可以获取最基本的信息。“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以2017年卷为例,分为三个类目:“考古学书目”“考古学论文资料索引”“新发表古代铭刻资料简目”。三个类目在考古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如“考古学书目”分为“总类”“田野考古资料”“考古学分论”“考古学专论”“美术考古”“古代科学技术”“古代文化生活”“民族考古和边疆地区考古”“宗教遗迹与遗物”“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志与历史地理”“中外关系与中外文化交流”“文物保护工作、大遗址和文化遗产保护”“世界古代文明与考古”十四个分目。这种全面系统的整理为知识服务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三、作为方法论的“体用”范畴与学科年鉴编纂原则

在《中国考古学年鉴》中知识体系与知识服务既各有彰显,又未割裂与偏废,内里总是相机整合,这已然表明了编纂实践潜在地因循着“体用不二”的原则。

“体用”范畴所延伸出的正确认识和处理本体与功能的关系逻辑与思维范式对学科年鉴编纂中知识体系与知识服务的处理具有切实的指导作用,“体用”范畴作为分析框架的同时也获得了方法论的意义。其作为方法论对学科年鉴编纂原则的进一步阐明有助于学科年鉴编纂水平的提升。

(一) 因体起用

“体用”范畴引导人们认识到一切事物均存在着内在本质(“体”)和外在功能(“用”),同时也给出了一种对于事物主次关系的解释路径,即“体重用轻”,“体”是根本的,第一性的;“用”是从生的,第二性的。由此考察学科年鉴的编纂,知识体系体现的是一门学科本身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是编纂所要因循的“体”,而知识服务则是在此基础上所

^①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87页。

构建出的提供读者“用”的路径和可能。因体起用,在逻辑上不可本末倒置。

因而,学科年鉴在编纂中应注意:第一,将学科的知识体系转化为学科年鉴框架的主体部分,并延伸至类目、分目等层次,使之符合读者已有的知识体系,便于快速检索和精准定位,符合知识体系的年鉴框架本身便承担着知识服务的任务。第二,全面客观收集上一年度该学科的相关信息,并对其真伪进行甄别,根据年鉴所要呈现的知识体系进行筛选,确保信息的相关性和真实性,以达到固体、强体的效果,从而保证知识服务的有效性。第三,实现信息的关联,通过编辑的加工,将零散、分散的原始信息资源整合升级为各类面向不同分支的次级知识结构和知识内容,这是构建学科年鉴知识体系的主体工作,也是最终实现知识服务的重要保障。

(二) 强体广用

“体”是“用”的基础和前提,无“体”,“用”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科年鉴所承载的知识体系的体量与质量深刻地影响其适用范围和在问题解决上的有效性。如一部学科年鉴不能全面反映学科及其发展情况与趋势,其利用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如《中国历史学年鉴》与《中国考古学年鉴》虽均为典型的学科年鉴,但前者主要以作为知识的“学科”展开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而较少涉及围绕具体“学科”建立起来的组织及其活动内容,在构架和部类设计上也更显精简。与《中国考古学年鉴》相比,《中国历史学年鉴》的“体”则较为薄弱,在使用上较难满足读者对上一年度历史学界主要机构、教学情况、学术活动等方面的知识需求。因此,学科年鉴编纂时,应考虑赋予年鉴知识体系适度的体量,保证其合理的适用范围,以备更广泛地解决读者可能遇到的与该学科相关的问题。

(三) 以用强体

学科年鉴框架虽主要由知识体系支撑,但知识服务作为“用”也在相当程度上对其进行塑造,因而在编纂中,也应注意“以用强体”,即从功能出发推动知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首先,应展开读者对年鉴需求及利用方式的调研,关注其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据此系统分析,尝试优化学科年鉴部类设置和知识层级设计,并尝试建构新的知识加工模式,从而提升学科年鉴作为知识产品的品质。其次,分析当前网络时代下新的应用场景和读者网络阅读习惯与需求,考虑借助新兴媒体技术及平台,构建符合这一场域的学科年鉴形态,将纯文字的知识向文图、音频、视频等多媒体形式拓展。最后,因“用”对“体”具有反作用,还应对知识服务的可行性进行判断,对知识体系有益的可采纳与融入,对知识体系有害的则应被过滤和排斥。

责任编辑:杨卓轩